

道义朋友三五人

——严济慈与郎之万的故事

严慧英



1931年12月1日,在北平(今北京)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一卷二期)登载了11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严济慈写的《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献》。紧接着,《科学》十五卷十二期(1931年12月)再刊此文。《科学》杂志的编者按写道:“郎之万教授为此次来华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四人中之一人。已于本年10月到京,爰将严君济慈此文急为登出,以饷读者。”

郎之万是何许人也?严济慈为何要写这篇文章介绍他?本文作者梳理出了严济慈和郎之万的故事。

严济慈陪同郎之万参观北平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郎之万其人

严济慈在《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说:“郎之万教授是我的老师,1931年访问中国,在北平期间是我接待的。他在法国的威望很高,与居里夫人齐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可以在巴黎召开各进步团体参加的群众大会。”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张著名的照片——1927年索尔维会议上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合影。照片上,前排正中坐着的是爱因斯坦,他右边坐着两撇八字胡的那位就是郎之万。

1888年,16岁的郎之万考入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校。此时,大名鼎鼎的皮埃尔·居里教授正在该校任物理实验室主任。居里教授“极赞赏郎之万的聪颖好学”,倾力相授。在名师指点下,郎之万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

经济制裁;批评国际联盟“不作为”,对日本侵略行为“袖手旁观”;指责美国自私自利以及目光短浅的对华政策。

郎之万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和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博得了法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48年,他逝世两年后,遗体被移葬于巴黎塞纳河南岸的国家先贤祠,与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等巨人并列,为世人所瞻仰和铭记。

郎之万中国行

1931年10月至12月,国际教育联盟应中国政府邀请,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教育文化等问题。据崔军伟《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华述论》一文所写,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此行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国家教育之现状,及中国古代文明所特有之传统文化,并准备建议最适之方案”。

其他成员一道返回欧洲,而是留在北平与中国物理学界又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的学术交流,直到1932年1月中旬才启程返法。

郎之万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加入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加强与国际物理学界的沟通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并表示自己愿意为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做牵线搭桥工作。

在郎之万的建议和推动下,1932年8月,李书华、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还有严济慈等人,在北平发起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并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由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老资格的留法物理学家李书华担任第一届会长,郎之万则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外籍会员。

郎之万和严济慈

郎之万1872年1月23日出生于巴黎,巧合的是,严济慈与这位异国老师竟是同一天的生日。严济慈生于1901年1月23日,比郎之万整整小29岁。冥冥之中,这师生二人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尽管分隔千山万水,终有亦师亦友的情谊。

有人说:“严济慈是我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也正是这个“晶体压电效应”串起了严济慈与法布里、居里夫人、郎之万等法国物理学大师的传承渊源。

1925年,严济慈在巴黎大学写博士论文,他的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给他的研究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这个题目源自皮埃尔·居里和雅克·居里兄弟的发现。早在1880年,同为物理学家的居里兄弟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并提出了举世公认的“居里对称原则”。这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并投入精力对其应用价值进行探索。比如,居里夫人在发现镭的放射性时,曾经用水晶片制成一台测量放射量的天平;郎之万在一战期间,也利用水晶片通电后发出的超声波,作为探测水下障碍的手段。

皮埃尔·居里的老师普曼教授推断,石英晶体压电效应的正、反现象的两个系数应该相等。可是,在1927年严济慈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前,皮埃尔·居里、伦琴等科学家都只测出了“正现象”,即石英受压后产生的电量的数据;对于“反现象”,皮埃尔·居里只是通过实验证明了它的存在,但一直无法测定其数据。1906年4月皮埃尔·居里不幸丧命于车祸,这项测定也就按下了暂停键。时光流转至1925年,严济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巴黎大学的规定课程,要着手写博士论文了。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以其慧眼看好这个聪颖勤奋的东方青年,把测定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这一重任交给了他。

由于这层渊源,可以想见,严济慈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注定不平凡。这个题目与故去的皮埃尔·居里兄弟有关,自然也会得到居里夫人、郎之万教授的关注和支持。居里夫人把早年皮埃尔·居里使用过的石英晶片借给这个东方青年使用;身为压电效应超声波研究专家的郎之万是早年皮埃尔·居里的得意门生,与居里一家人过从甚密,更是给予了承继皮埃尔·居里实验课题的东方青年许多切实的指导和帮助。由此,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严济慈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验,终于攻克了难关。揭开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秘密。不仅完成了导师指定的任务,而且还有所拓展。他把论文题目具体为《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经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在法国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轰动了巴黎。《巴黎时报》等各大报纸纷纷采访论文的作者,还登出了他的照片,慷慨地给予这个东方青年莫大的荣誉。

超越科学的深情厚谊

1931年,郎之万来华考察时,即将年满60岁。此时,他早已功勋卓著,名声显赫;而严济慈刚跨而立之年,正是踌躇满志、科学研究力最活跃的鼎盛时期。严济慈于1930年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先生之邀,筹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郎之万的到来,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北平物理研究所,以及刚起步的中国物理学事业,无疑有巨大的鼓舞意义和切实的指导作用。严济慈奋笔写成《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一文,详细介绍郎之万物理学研究工作的成就和意义,对郎之万的科学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严济慈还全程陪同了郎之万在北平的考察和参观,协助安排其在北平的各场讲演,并担任多个讲演的翻译。1932年1月4日和7日,严济慈陪同郎之万参观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理化部。他们介绍了各自的“石英水晶压电反现象”应用研究的进展情况,讨论电磁波在大气游离层中传播问题,相互交流心得,切磋难点。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物理学水平高于美国,而法国又处于欧洲的顶尖水平。郎之万这次访华,使得严济慈及时掌握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对保持世界水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11日郎之万离开北平回法,之后,严济慈还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交往频繁。

1935年,在郎之万和法布里的推荐下,严济慈当选了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37年,严济慈陪同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石曾到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会议期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在国际文化合作会议讨论保护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时,严济慈走上讲坛,悲愤地对与会代表说:“各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京……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性企图!”

当严济慈得知中共高层负责人吴玉章从莫斯科来到巴黎宣传中国抗战,想要会晤郎之万教授时,马上联系郎之万教授,安排他和吴玉章会面。由于郎之万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吴玉章在巴黎的多次公共集会上,大力宣传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无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自此,严济慈与郎之万从师生关系成为同道伙伴,相互间建立了超越科学领域的深情厚谊。

严济慈的客厅里挂着李石曾题写的一副对联:“温凉天气二八月,道义朋友三五人。”严济慈与法布里、郎之万、居里夫人等法国科学家的交往和情谊,正是基于对科学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他们是真正的道义朋友。(本文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鲁迅先生与漫谈会

冒建国

当年,上海文化界人士常聚在内山书店里“漫谈”,称为“漫谈会”。与会者有作家、画家、新闻记者、演员、医生和大学生,还有实业家、职员、军人参加。据与会者回忆,漫谈的主要内容是世界新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国内重要新闻。

漫谈会形式比较松散,没有什么严格的议程,各抒己见,也认真听别人发言。日本作家横光光一乘上海旅行时,就被漫谈会吸引住了,向导催他外出游览时,他说:“听这里的漫谈会比逛街有意思。”

鲁迅先生是漫谈会的常客。从1932到1936年这段时间里,他只要有空暇就到漫谈会去。由于漫谈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所以能够听到各种要求、意见与呼声,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观察社会的窗口。尤其是对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有更大的裨益。鲁迅先生在

这里倾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使他更接近人民,他后期那些思想性较高、战斗性强的杂文多是从漫谈会中汲取了社会营养,也多是在漫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构思的。他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不止一次地给漫谈会以高度评价。

同时,鲁迅又是漫谈会受欢迎的发言者,他能对许多复杂问题发表精辟的见解,给大家许多有益的启迪,也能把抽象的道理解释得通俗易懂,因而常常博得与会者的好评与赞赏。据日本友人奥田杏花回忆,鲁迅几次谈到中日关系恶化都认为是以强凌弱,难以亲善,并心情沉痛地说:“从直观说来,是在冲突着了。”

据日本《朝日周刊》记载,1936年10月17日,就是鲁迅逝世前两天的黄昏,他还到漫谈会去了,不过这次鲁迅始终保持沉默,静坐在那里听别人发言。



胡适题写“徽骆驼”

周星

胡适把吃苦耐劳、四海为家的家乡人称作“徽骆驼”,把徽州人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他一生倡言“努力做徽骆驼”。

1945年,胡适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了“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1946年秋,他在南京又为徽州会馆题写了“努力做徽骆驼”的激励之词。因为胡适的宣传,“徽骆驼”作为徽州人的象征,其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日俱增,但凡旅居在外的徽州人,无不以自己是“徽骆驼”而备感荣光和自豪。

1953年1月10日,“绩溪旅台同乡会”在台北市泉州街铁路饭店举行茶话会,欢迎胡适回台湾讲学,并共

同为他庆祝62岁生日。与会乡亲闻讯,四处奔波,然而乡音未改,欢聚一堂,品茗畅叙。席间,有人提议请胡适为本次活动题字留念。胡适用徽州话笑着说:“写些什么好呢?”他略思片刻,即兴题写了“努力做徽骆驼”6个字,深情冀望各位乡亲不要忘记老家,激励大家要坚守徽州人吃苦耐劳的本色,发挥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的“徽骆驼”精神,凡事坚持忍耐,能吃万般苦,借以与乡亲共勉。

后来,安徽绩溪旅台同乡会创办人胡钟吾将胡适的题字复制裱褙,分发给全体旅台同乡,作为他们共同的精神标识。



洪深抱病“三马同台”

刘兴尧

洪深是著名的戏剧编剧、导演,也会演话剧。其实,他的戏曲也很有功力,曾和著名演员梅兰芳、周信芳同台演出。

1955年4月,那时的洪深已经重病缠身,他是肺癌晚期,自知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当时正好是梅兰芳和周信芳从艺50周年的纪念活动,洪深和梅兰芳周信芳是好友,三人又是同年,都属马,因此他和二位戏曲大师的感情很是深厚。为了表达对老友从艺50周年的庆祝,洪深强撑病体,决定亲自上台,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演出《审头刺汤》的一折戏。由于三人都属马,因此时人称之为“三马同台”。

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洪深一丝不苟,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非常到位,和梅兰芳周信芳配合得天衣无缝。获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其实观众不知道,洪深是拖着病体在演出。台上

的梅兰芳和周信芳作为老友,自然知道洪深的身体状况,在台上非常紧张洪深的身体,时时刻刻在关注着他,但是直到演出结束,洪深都没露出异常。其实,他涂着油彩的脸上经常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是,台下的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梅兰芳和周信芳对洪深如此拼命为他们的庆祝活动演出自然是非常感动,感谢时,他们把洪深推到了最前面,让洪深去接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洪深深深鞠躬对观众致谢,他在心里暗暗和老友告别,和文艺界告别,和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因为他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台下的好友阳翰笙看出了洪深的内心所想,他一边拍着手,一边悲从心来。

洪深以这次“三马同台”演出为自己的戏剧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艾青的风趣

王剑

艾青是“时代的歌手”,他为人率真,风趣幽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的一天,艾青到徐悲鸿家聚餐。酒过三巡,徐悲鸿借着酒兴,把艾青等人领进自己的画室。只见屋内的墙上挂满了骏马图,栩栩如生,令人惊叹。参观结束后,徐悲鸿用手取下一幅画,送给了艾青。艾青醉眼朦胧,来不及细看,便把马“牵”回了家。第二天清晨,艾青酒醒再看那幅画时,发现马的眼睛画坏了。此后,每与人谈到此事,艾青都会嘿嘿地笑着说:“徐悲鸿也太太小气了,他趁天黑送了我一匹瞎马。”

1951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访问中国,艾青出面接待,陪同聂鲁达到北京胡同里的风味餐馆品尝小吃。闲聊时,艾青打趣地问:“聂鲁达的‘聂’,汉字由三个耳朵写成。这样你头上便多长了一只耳朵,你想把它放在哪里呀?”聂鲁达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把它放在前额上吧,可以让它倾听未来。”宾主对望一眼,不禁哈哈大笑。

艾青谈诗论文,也多有风趣之语。有一次,他与文学青年座谈,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有真情的诗是好诗。”他停顿了一下,风趣地说:“有一次我回故乡去,正好碰到有人家办丧事。一个年轻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死——宁隔千重山,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出来的这两句,就堪称好诗!”

艾青的诗作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有几位研究者就提出“艾青是继屈原、杜甫之后中国第三个伟大诗人”的命题。艾青听说后,幽默地说:“论我就论我,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随便拿古人和今人作比。比如,我是水牛就是水牛,是骆驼就是骆驼,是毛驴就是毛驴,一定要说我是——一匹马,比谁都跑得快,这不太合适嘛。”

1986年春,艾青的诗集《鱼化石》获得全国新诗奖。颁奖会当天,76岁的艾青在宾馆里突然昏厥,大家急忙把他送进医院抢救。艾青苏醒后,看见大家惊慌的神情时,竟像朗诵诗歌似的调侃道:“当——当——听,上帝敲响了我的丧钟!”